

“明代宫廷史丛书”首四种出版

李成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1 世纪初,故宫博物院提出了“故宫学”,发动并联合故宫内外海峡两岸的学术力量,利用故宫博物院的优势,展开了相关研究。多年来,明代宫廷史的研究一直相对比较落后,不仅是故宫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且也是整个明史研究领域内较为薄弱的部分。因此,故宫博物院集中力量,全面展开了对明代宫廷史的研究。2005 年,确立了明代宫廷史研究的 18 个重要课题,其中包括明代宫廷典制史、明代宫廷政治史、明代宫廷财政史、明代宫廷外交史、明代宫廷建筑史、明代宫廷园林史、明代宫廷生活史、明代宫廷宗教史、明代宫廷女性史、明代宫廷宦官史、明代宫廷书画史、明代宫廷陶瓷史、明代宫廷工艺史、明代宫廷织绣史、明代宫廷家具史、明代宫廷文学史、明代宫廷图书史、明代宫廷戏剧史。这里面既有对传统课题的研究,又有对新研究领域的开辟,同时又对相对少见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以丛书的形式集中发布。2009 年又成立了“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整合故宫内外的研究力量,进一步发挥故宫在宫廷史研究方面的特殊优势。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 85 周年、紫禁城建城 590 周年之际,2009 年 9 月,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批“明代宫廷史丛书”4 种,即《明代宫廷戏剧史》、《明代宫廷陶瓷史》、《明代宫廷建筑史》、《明代宫廷典制史》(上、下册)。这既是对这次庆祝活动的献礼,同时也是“故宫学”提出以来的学术成果之一。

这几种书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明代宫

廷史丛书”的整体特点,那就是注重文物与文献相结合,历史研究与考古等相结合,学术探索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局部研究与系统研究相结合,发挥了故宫博物院以“物”见长的优势,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明代宫廷戏剧史》,李真瑜著,40 万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述其初兴、发展和演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洪武初兴,健全宫廷演乐机构;永乐更定乐章,整理剧本。第二个时期,经历了正统至天顺的沉寂之后,迎来了成化至弘治年间的复苏;正德年间则因皇帝本人的原因而出现了喧闹之象;嘉靖整肃“新声巧技”,重定乐章;至隆庆时期,北曲渐衰,南曲日盛。第三个时期,万历时宫廷演剧体制发生了变化,增设“四斋”和“玉熙宫”;天启自创自演;崇祯时苏州女乐进宫,揭开了明代宫廷戏剧史新的一页作。作为明代宫廷戏剧的余续,南明弘光朝宫廷中仍然“平阳歌舞未曾休”,可是不久,南明朝廷就在“一曲《春灯》《燕子笺》”中灭亡了。下编是专论,论明代的优伶与政治,论其演出场所及舞台艺术,比较宫廷戏剧与民间戏剧的异同与互动,比较明清两代的宫廷戏剧。明代宫廷戏剧的文化属性与功能有两个方面:礼仪与娱乐。其之所以能成为宫廷戏剧,正是因为第一个属性与功能,而娱乐功能是次要的。作者并没有把宫廷戏剧作为宫廷礼乐活动的附属品来看待,也没有单纯地将其看作是皇帝、妃子们娱乐的工具,而是以戏剧为本位,将其放到明代整个戏剧文化的发展中进

行考察和研究,使明代宫廷戏剧的历史过程与面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本书的可贵之一。戏剧所反映的往往不仅仅是戏剧本身,它的背后还有许多东西,作者能通过戏剧的表面看穿其背后的东西,这是本书的可贵之二。如明初洪武年间,元末高明创作的南戏传奇《琵琶记》在宫廷中盛行,并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确立的“样板剧”。在盛行北曲的明初宫廷,为什么南戏《琵琶记》会成为样板?作者结合《琵琶记》的内容和朱元璋的政治理念,认为“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看到了《琵琶记》符合其‘文治’需要的文化意义”(第62页),能起到教化民风的作用。此外,作者从戏剧学的角度对明代宫廷戏剧的舞台艺术进行了研究,虽然其深度可能并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尝试。

《明代宫廷陶瓷史》,王光尧著,34.3万字。陶瓷史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能超越前人,做出新意,实属不易。作者屡屡推陈出新,在不少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关于景德镇御窑厂建立的时间,学界向来争论不一,有洪武二年说、洪武末年说、洪武三十五年说、宣德初年说四种,作者早年亦持宣德初年说。作者爬梳史料,并结合当时政局的变化、皇帝的心理进行逻辑推理,反驳了以上四种观点,指出自己早年坚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而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宣德皇帝在位的洪熙元年(指宣德皇帝六月嗣位至十二月)说。生产经费在官营手工业中向来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作者从明代御器厂的经费来源及核算制度中看到了明代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经济问题。明代御窑厂生产经费全部由工部奏销,窑厂只负责生产而不用考虑成本;而且由于当时的预算远高于成本,核算又不严格,所以对于生产成本是多少,落选品如何处理以降低成本,督陶官和窑厂一概不关心。明代晚期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改革,

没有成功,但是这种改革到清代取得了成功。同样的改革方案,在明清两代的结果却不相同,作者从这一小事中看到了更深的问题,认为这“折射出明朝万历以后已没有自我调整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这是“明代晚期家国大政在御用瓷器烧造小事上的具体反映”(第287页)。此外,作者还梳理了从洪武二十六年加强皇权的各项法令出台、提出供用器皿的概念,经永乐改革,到宣德继位后派内官直接管理瓷器烧造事务、并明确提出御用瓷器概念的全过程,认为,至此明代瓷器的御用性凸显出来,并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在整本著作中,作者新意屡现,足见其功力之深,着力之多。

《明代宫廷建筑史》,孟凡人著,55万字,考察了明代与宫廷有关的建筑,包括中都、南京和北京的皇城与宫城的营建、形制与配置等问题,其中重点研究了北京紫禁城的情况;此外,对天、地坛等诸坛,明初三陵与十三陵等陵墓的构建、形制布局及其主要特点和艺术特色也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作者将史学、建筑学和美学结合在一起,用多种方法多角度来研究明代的宫廷建筑:用史学的方法考察其营建的背景和过程,以及重建、改建和增筑的情况,并探讨北京紫禁城形制布局的源流,其中还穿插着对某些重要建筑物的建筑指导思想的探讨,使读者对其发展演变的情况一目了然;同时,从建筑学的角度详尽地研究了明代宫廷建筑的地基、配置、形制及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建筑工艺等;又从美学的角度考察明代紫禁城的规划设计理念、规划设计方法及其布局艺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难度很大,对专门作某一学科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尤其难得。多年来,不少人在研究明清宫廷建筑,但是多从建筑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对明代宫廷建筑以史为主线,将建筑学、美学揉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了了无几,本书的出

版,弥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称得上是一部明代宫廷建筑史的力作。

《明代宫廷典制史》(上、下册)是集赵中男、高寿仙、王熹等十几位专家学者之力而成的一部巨著,全书82万字。典制向来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研究课题,宫廷典制更是让人望而却步。《明代宫廷典制史》(上、下册)的出版为该方面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本书以传统的五礼——吉礼、凶礼、嘉礼、宾礼、军礼为参考,列登极、册立、祭祀、朝仪贺仪、婚礼、冠礼、修书仪制、教育仪制、巡守监国与军礼、丧葬陵寝、宴享、乐舞、仪卫、宫室、宝玺、符牌、服饰十七个部分,开篇又述典制史之来龙去脉、发展概况和研究综述等。这基本上囊括了明代宫廷典制史的大部分内容,系统

而又全面。尤为可贵的是,本书的每一位作者不仅仅对相关典制的内容有较深了解,还对该典制的实施和演变有一定的考察,对其产生和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熟悉,所以能动态地写出该典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相关的因素,挖掘出其背后的东西。对明代宫廷典制在中国典制史上地位的评述,没有对整个中国制度史,甚至包括政治史、文化史的全面深入的了解或研究,是难以落笔的。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对明代宫廷典制在中国典制史上地位所作的述评,精辟而深刻。

这几种书的出版,弥补了多年来明代宫廷史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故宫学”的发展,也为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评《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

温长松

(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泉州 362000)

满族是建立后金和清政权的主体。盛京地区(主要是今辽宁)是满族的故乡和清朝的发祥地。清史、满族史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占重要的地位。盛京地区满族历史研究对于清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乃至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史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留存至今的记述清代盛京地区满族的文献资料较为匮乏。留存下来的清代盛京地区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书共五部,分别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编纂完成的。乾隆晚期一直到清朝统治结束,关于盛京地区满族的历史记载国内现存文献基本上是空白。史料的缺乏影响了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

2009年7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一书。该书所指的韩国三种史料是在朝鲜李氏王朝英祖、正祖、纯祖时期,朝鲜政府出使清朝的人员所撰写的日记体文献,即《入沈记》、《沈槎日记》、《沈阳日录》。三种韩国史料属于古代史志书籍,著作的作者都是当时亲身经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同时也对清朝社会状况等有着较为直观的认识;并且以文字形式将其访问、参观、游历的事件记述下来,使之成为研究该时期、该地区历史与现实有重要价值的史籍。三种史料由韩国学者编入《燕行录》,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